

術數史上的奇人與奇書

姚廣孝與《三悟真詮》

◎江燦騰

《三悟真詮》是中國術數史上的一部奇書，它擺脫了傳統術數作品外因論和宿命論的色彩，而從動態中作分類和解說。但是這本書的真正作者是誰？目前仍未成定論，可以確定的是姚廣孝的術數思想和《三悟真詮》有頗多相近之處，本文試圖為兩者之間的關係提供一些線索。

姚廣孝（一三三五—一四一八）

是明初協助策劃「靖難之變」的第一功臣，這是讀過《明史》的人都知道的。

在《明史·姚廣孝傳》，對姚廣孝其人的出身，有很扼要的介紹。說他是長洲人，本醫家子。十四歲出家，名道衍，字斯道。事道士席應真，得其陰陽術數之學。嘗遊嵩山寺，遇相者袁拱對他說：「是何異僧，目三角，形如病虎，性必嗜殺，劉秉忠流也。」道衍聞之大喜。

劉秉忠的事業成就，是姚廣孝生平最

仰慕的榜樣。

為什麼道衍身為出家人，聽到相命者的如此批評，不但不生氣，反而高興呢？《明史》的資料，沒有進一步的解釋。

其實，劉秉忠就是佐忽必烈定天下的臨濟宗僧侶，法名子聰。子聰後來還俗，官至太保，曾協建大都，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城市設計師之一。姚廣孝出生在元末，自然對元朝的開國勳臣事跡，不會太陌生。甚至可以說，劉秉忠的事業成就，就是他生平最仰慕的榜樣。例如他的詩集裡，曾

記載他人燕謁劉秉忠墓後的心聲：

良驥色同群，至人跡混俗，
知己苟不遇，終世不怨謫。
一朝風雲會，君臣自心腹。
大業計已成，勳名照簡牘。

此詩的前半段，是敘說英雄待時的心境。後半段，則描述君臣相投，英雄建大業垂名後世的榮光。清人朱彝尊批評道衍的謁劉秉忠墓詩說：「觀其人燕兩謁劉太保墓詩，蓋早已以藏春子（劉秉忠）自命矣。」

但是，就相者袁拱的批評來說，道衍的喜悅卻非因為指出他的面貌和劉秉忠相似這一點。他在元至正二十五年（一三六五），曾寫詩〈贈相士袁廷玉〉，詩中提到：

岸幘風流閃電眸，

道衍禪師姚廣孝像。



相形何似相心優？

凌烟閣上丹青裡，

未必人人畫虎頭。

換句話說，外貌相似並非重點，理想接近和事業成就如何，才是他所關心的。像這樣在術數中保有個人認知自主性的心態，是姚廣孝的生平特質之一，是想瞭解他的人，不可忽略的重點。

在《明史·姚廣孝傳》裡，關於道衍事道士席應真，得其陰陽術數之學的內情，同樣也沒有交代。然而，讀史的人不免要留下一些疑問：一、為什麼身為和尚的道衍，卻要去事道士席應真？二、席應真的「陰陽術數之學」，又有些什麼奇特之處呢？三、道衍又如何應用所學呢？

在過去，這些問題的說明，是很困難的：一、三兩點，還略有資料可查；至於第二點的「陰陽術數之學」，

因未找到著作，幾乎只有憑想像推測或略去不談了。

元朝時，佛教是特權階級之一；姚廣孝因此寄身禪林，俟機建立功業

我在《史原》第十七期，曾發表〈道衍禪師的生平與佛教思想〉一文，其中對道衍的出家背景和他出家後的心態及思想，都作了詳細的分析。當時，我根據佛教的資料，綜合大陸學者商傳和日本學者牧田諦亮的一些看法，認為道衍的出家是有目的的。他想想在佛教界求發展，因此他對家人提出出家的理由是：為學有成，則仕於王朝，榮顯父母，否則就學佛，為方外之樂。

在元代，佛教是特權階級之一，民眾藉出家來尋求較好的出路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何況劉秉忠就是最佳的例子。也因此，道衍出家後，追隨的師父愚庵智及（一二三二—一三七八），即是精通儒佛、並以文采驚動金陵文士名流的大禪師；元末時，已由朝廷任命主持江浙一帶的大寺院。明洪武五年（一三七二），他在朝廷徵召的十名有道高僧中，更是排名第一。追

隨這樣的師父，黃緣際會，要出頭自是比較容易。例如道衍在洪武八年（一三七五），即以「通儒」被召，留京師天界寺一年。而洪武十一年智及圓寂時，道衍以大弟子兼普慶寺住持的身份，請名文學家宋濂撰「塔銘」。可見他出家時的估算，是和現實的環境相應的。他後來的事業成功，也是有跡可尋的。

不過，我在論文發表後，才在李焯然先生的《明史散論》（台北：允晨出版社，一九八七）裡，讀到姚廣孝著有一本《三悟真詮》，同時他作了如下的資料說明：「今研究道衍之政術，當以其《三悟真詮》最為重要。《三悟真詮》（清鈔本，卷首有道衍永樂七年序）不分卷，主要由《星悟》、《穴悟》、《心悟》三篇組成，卷首道衍《三悟序》云是書乃席應真所傳，『顧瞻天下，又卒無可授者，乃取其大意而增損之，又以平生閱歷軍中決勝之機附之於內，合成此書，名曰《三悟》，藏之名山，以俟後人。有能得此書者，須細玩之，可為帝者師，但未可輕以示庸人耳。』（葉一上一下）卷後附王守仁之《跋》云：『余少遊金陵，偶遇僧人濬井，得石